

公共经济学

手册

第①卷

〔美〕阿兰·J·奥尔巴克 / 主编
马丁·费尔德斯坦
匡小平 黄毅 / 译
郭庆旺 / 校译



HANDBOOKS IN ECONOMICS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1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公共经济学手册

第 1 卷

[美] 阿兰·J·奥尔巴克 主编
[美] 马丁·费尔德斯坦

匡小平 黄毅 译
郭庆旺 校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1

Edited by
ALAN J. AUERBACH

and

MARTIN FELDSTEIN

责任编辑：崔新艳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公共经济学手册（第1卷）

[美] 阿兰·J·奥尔巴克 主编

[美] 马丁·费尔德斯坦

匡小平 黄毅 译

郭庆旺 校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富达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30.25印张 560000字

2005年12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058-4461-X/F · 3733 定价：98.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经济学手册》编译委员会

主任：高鸿业 蒋宝恩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国	王守志	王传纶	文 魁	方齐云	方福前
任明辉	史培军	平新乔	刘凤良	安虎森	孙鸿敞
张卫东	张建华	张培刚	张晓峒	张维迎	陈雨露
陈银娥	吴 明	吴汉洪	吴易风	李文溥	李晓西
李桐连	陆杰华	余学军	胡世凯	胡培兆	姜 洪
姜鲁鸣	郝寿义	钟学义	高鸿业	郭庆旺	郭熙保
徐长生	曹 阳	曹志刚	董克用	蒋宝恩	曾湘泉
蔡仁华	蔡继明	谭崇台	魏权龄		

《经济学手册》中文版总序

编写《经济学手册》的目的和必要性在于对过去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即删繁就简，使之条理化并加以适当的解释和评价，以便使读者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较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成果的内容。因此，《经济学手册》是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有用的参考著作和工具用书；它也能为高学位的研究生提供辅助性的阅读材料。

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部影响较大的系列性的经济学手册。一部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出版的《剑桥经济学手册》，另一部便是这部由埃尔塞维亚科学出版社—北荷兰出版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陆续出版的《经济学手册》。大致说来，前者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后者则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文献加以最高水平的总结。把二者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到，手册的必要性越来越为明显。到了目前，甚至可以说，除非借助于手册类丛书，已经很难洞悉西方经济学的全貌，其原因在于：在 20 世纪中，特别在它的后半期，西方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经济学的《剑桥经济学手册》共有 10 册，涵盖当时的经济学的 10 个分支学科。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部《经济学手册》已出版了近 60 册，目前包括 25

个分支学科。二者相对照，分支学科增长了将近一倍。对照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进展，西方经济学的分工愈来愈为细微，而文献的数量日益增长。这种分工细微和文献剧增的事实使得学者和研究人员难于洞悉西方经济学的全貌。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出现于职业杂志的文献，我们在这里以职业杂志为例来说明在今天了解西方经济学全貌的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职业杂志不超过10种，此外，它们一般并无分支学科的区别。然而，到了目前，这种杂志的数量已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分支学科的区别日益细微。不但金融、货币、管理、学说史、能源与发展等具有各自的专业刊物，而且，即使在原有的分支学科中，进一步区分的倾向已经出现。例如，在两年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发行《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在原有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上，又出现了专业动态分析的分工。

由于分工的细微和文献的剧增，如果说，在《剑桥经济学手册》的时代，学者尚有可能直接从第一手著作中得知西方经济学的全貌，那么，在今天，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一方面，个人已经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如此巨大数量的文献。另一方面，分工的细微要求阅读者必须具备较深厚的专业技术知识才能理解文献的内容。再以宏观经济学为例，非线性的动态分析，随机变量在时间序列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要求相当高深的数学、数理统计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非短期内所能掌握的。因此，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总结性的著作的帮助，而这部《经济学手册》就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此外，这部《经济学手册》还具有下列三个特点，使它能对读者的帮助更为有效：

第一，权威性。上面已经指出，作为总结性质的著作的手册，

编写者必须删繁就简、使之条理化并作出适当的解释和评价。换言之，编写者必须具有权威性，即具有足够的学术造诣才能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从而使读者受益。以此而论，这部《经济学手册》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经济学手册》的总主编为诺贝尔奖得主 K. J. 阿罗和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上享有盛名的 M. D. 英特里盖特。各分支学科以及其中每一章的编写者都是有关领域的居于领先地位的学者，一般都是知名的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和专家。例如，宏观经济学分支学科中的“经济增长论”一章系由索洛所编写。索洛曾由于早年在经济增长论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以后，一直从事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这种权威性使他能对“经济增长论”做出坚实可靠的总结。这一事实并不限于增长论，其他分支学科的主题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对这部《经济学手册》中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分册，西方著名的区域研究的评论写道：“总之，这是一部由该领域内从事前沿研究的专家撰写的力作。……它将成为区域科学领域内科研和教学人员的一部标准参考资料。”

第二，全面性。上面提到的西方经济学分工的细微化，一方面使分支学科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各分支学科的内容不断扩充。由于这部《经济学手册》不但能为新添增的分支学科设置分册，而且也涵盖了各分支学科内容的扩展，所以它具有全面性，即能对西方经济学整体内容做出面面俱到的总结。以分支学科在数量上的增加而论，这部《经济学手册》含有《博弈经济学手册》、《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自然资源和能源经济学手册》，甚至《国防经济学手册》等分册。以分支学科在内容上的扩充而论，这部《经济学手册》囊括了各分支学科扩充的每一个方面。以宏观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为例，当该分支学科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最初形成时，其内容仅包括以 ISLM

为代表的基本理论再加上一些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和政策建议。然而，在这部《经济学手册》中，宏观经济学分支学科却占有三卷的篇幅，由七个部分所组成。它们顺次为：宏观数据分析、动态分析方法、经济增长模型、消费与投资、经济周期模型、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七个部分足以代表宏观经济学在目前的整体内容。

第三，新颖性。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具有演变特色的学科。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后者不但反映了前者的变迁，而且必须改变自己，以便适合前者的需要。流行的西方教材往往每隔三五年便出现更新的版本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从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可以窥测到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动、思潮的转移、政策的改变等动向，因此，了解它的新发展是有其重要性的，而这部《经济学手册》编写的取向之一便是新颖性。例如，在它的原版简介中，两位总主编写道：“本系列手册中的每一本系对经济学中的每一门分支学科的最前沿的发展，根据其内容分成各章并做出全面的总结。”在其后，他们又写道：“总结的范围不但包括已被认同的成果，而且也涵盖来自职业杂志和探讨性文献所代表的较新近的发展。”又例如，对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西方的《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杂志》的评价是：“手册精选的文章令人难忘，它们为我们指明了产业组织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很可能由于其权威性、全面性和新颖性，这部《经济学手册》成为西方经济学有史以来第二部影响较大的系列性的手册。根据西方人士计算出的判别影响力大小的“影响因素”，这部《经济学手册》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的“影响因素”为 6.02，超过了专门从事于总结西方经济学新发展的《经济学文献杂志》，其“影响因素”为 5.55。其他的一部分分册的“影响因素”超过了

一些久负盛名的西方职业杂志。例如，《国际经济学手册》和《劳动经济学手册》两个分册超过了《经济学季刊》，而《计量经济学手册》则超过了与计量经济学这一学科于20世纪30年代同时起步的《计量经济学杂志》。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的分支学科手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部《经济学手册》的影响力还随着出版年份的增加而扩大。例如，《公共经济学手册》被引用的次数在出版一年后为10次，第二年后为40次，在第三年后的几个年份中则被维持在50~60次的水平。如此看来，这部《经济学手册》在今后的年份中还会继续保持其影响。

这部在西方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手册》也可以在我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对于这部《经济学手册》中的《公共经济学手册》，西方的《国际管理科学评论》的评语写道：“这部杰出的著作不仅会令美国的教师和学生感兴趣，而且会引起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关注。它不仅是一部翔实的手册，而且是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现在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百科全书。”这一评语也应该适用于全部的《经济学手册》的各分册。以我国的情况论，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使我国对外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在今天，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我国不但要遵守国际公认的“游戏规则”，而且还要参与“规则”的制订。这样，无论从借鉴吸收、洋为中用的方面，还是从知己知彼、筹谋对策的方面来看，这部《经济学手册》都是一部有用的参考著作，因而应该是我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工具书籍。此外，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生的要求的提高，它也可以被用作我国高学位研究生课程的辅助性教材。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在使用这部总结西方经济学最近发展的《经济学手册》时，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鉴别，方能从中得到真正的益处。

这部《经济学手册》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定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笔者被告知，这部《经济学手册》的中译本的版权费达200万元之多。笔者也深知，参与全部《经济学手册》翻译工作的众多学者都是对各个专业有造诣的人士和单位。可以看到，为了这部《经济学手册》而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的巨大规模是我国学术和出版界不多见的。尽管如此，和它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相比，中译本的《经济学手册》仍然是值得为之而从事的工作，从而也是值得为之而庆幸的事。

高鸿业

2001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手册》简介

本《经济学手册》是手册性质的系列著作，其目的在于为专业研究人员和高学位的研究生提供最有权威性的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和阅读素材。本系列手册中的每一本系对经济学中的每一门分支学科的最前沿的发展，根据其内容分成各章并做出全面的总结，而各章的执笔均为分支学科的有关领域的领先学者。总结的范围不但包括已被认同的成果，而且也涵盖来自职业杂志和探讨性文献所代表的较新近的发展。虽然各章含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但各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全面的和较易于看懂的总结。本《经济学手册》不但能为专业者的文库提供比较有用的参考著作，而且也为经济学研究的高等课程提供有待于选用的阅读教材。

K. J. 阿罗

M. D. 英特里盖特

译 者 序

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和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其研究重点是探讨公共部门的最优活动范围与最适组织方式，预测公共部门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公共政策。与传统的财政学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经济分析等），而且改进与完善了研究方法。传统财政学将国家的意志或决策视为外生变量，公共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个组织系统，其意志由政治程序决定，并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程序的经济效应；传统财政学无法把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统一到帕累托效率状态，公共经济学则建立了两者一致的理论模型。

—

公共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出现只有几十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前，研究公共部门经济问题的绝大多数著述均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冠名。此后，一些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将以公共经济学作为其著作名称。这种改变不是偶然的，它标志着传统财政学科的规范研究、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等诸方面均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这一学科更加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和经验实证分析，更加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实际问题（马丁·费尔德斯坦，2002）。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下文所说的各种变化，都属于财政学科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结果，这一点同其他任何学科的发展一样。只是“Public Finance”英文语义无法涵盖这些变化了的内容，所以要用“Public (Sector) Economics”取而代之。但是，在汉语中，“财政学”没有这样的局限性，不一定非要改名，更不能说“公共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一）规范研究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经济学的规范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这部书不再像早期的财政学著作那样只用图表和数字来描述，而更像一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著作，它采用局部均衡方法，以图表和数字来分析税收对价格和产量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引起的效率损失，核心内容是分析财政收支的归宿和效率以及对买卖双方所产生的效应，它没有详尽地去描述税收规定或税务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这部著作开拓了财政学分析的新领域，但由于它的数学运用还不够多，因而难以展开多产品问题分析，也难以阐述一般均衡效应。在这一时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尚缺乏计量经济分析的内容，也没有对政府支出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经济学分析。

但以此为基础，规范研究逐渐取得了重要进展。1962年，哈伯格运用了简单一般均衡模型对公司所得税的归宿问题进行了研究。哈伯格的分析克服了早期关于税收向前转嫁和向后转嫁的模糊描述的弱点，证明了生产与消费的替代弹性和消费者偏好等如何影响公司所得税税负在劳动、资本、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在以后的研究中，哈伯格还证明了传统的福利损失三角可用以对不同产品的多种税收的分析，并用以估算公司所得税的净损失。黑格等人还对某些产品不征税或某些产品以任意税率征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设计多种产品的消费税，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随着这些方面的理论进展以及经济学领域中的数学运用，人们对拉姆齐最初提出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也有了重新认识。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 Mirrlees，又译为詹姆斯·莫里斯）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拉姆齐的理论分析，证明了维持生产效率的最佳条件和实行传统的逆弹性规则的一般条件。米尔利斯还创立了一个最佳劳动所得税模型，这种分析方法使得人们弄清了最佳化问题的实质。米尔利斯等人在此基础上对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最优组合进行了设计，他们的研究表明，最优税收原则取决于效用函数的某些不可观测到的特性及其他一些因素。金等人则把米尔利斯的最优税收分析方法扩展到了财政支出领域，费尔德斯坦对资本所得税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公共经济学的这些规范研究虽然对于许多问题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非常重要，它们至少指出了一些早期观点所存在的错误，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并提出了具有实质进展的分析思路，这些进展也鼓励和吸引了大批学者从事公共经济领域的研究。

（二）经验研究

公共经济学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进展是经验性研究。由于科学技术的重要

进展，高速计算机的出现，人们设计了可靠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建立了大型的数据库资料，发展了成熟的计量经济学技术，使公共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税收对劳动参与度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如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对妇女参与劳动的程度和劳动时间有重要影响，而对男性的劳动供给则没有明显影响。人们也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利息所得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但证明存在相当大困难，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有关储蓄的数据资料，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减少对储蓄的税收会增加储蓄总水平。另一类重要的经验研究内容是资本利得税率如何影响家庭财富在各种形式金融资产中的分配。尽管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税率差别和税法改变对家庭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人们就边际税率对房屋所有权的影响、税收对慈善捐款和健康保险需求等方面的影响也进行了经验研究。可以说，人们对于与家庭有关的所有税收都进行了经验研究。

此外，一些经验研究分析了税收对个人风险承担和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这些都大大增进了人们对税收的政策含义的理解。但是，由于不断有新的税收政策出台，数据资料将不断改进和完善，经验研究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结论会更加可靠。

（三）研究范围

过去几十年来，公共经济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主要扩展的领域是：（1）对社会保障等重要财政支出项目的研究；（2）对财政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关系的研究；（3）对地方财政问题的研究。

财政支出研究。传统的财政学研究主要涉及税收问题的研究，但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日益扩大，政府支出影响的日益深入，对政府支出的研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增加根源于社会保险项目等开支的增加，公共经济学中的研究重点自然应该与之相适应。由于社会保障、失业保险、老年人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补助等项目的金额日益庞大，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越来越成为公共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领域。社会保险项目不仅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而且对它的分析与税收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公共支出项目的研究不仅要分析项目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支出目标，而且要分析项目的再分配效应和额外负担；对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还要考虑提供的保险程度与对激励的扭曲程度之间的替代关系，这与对课税过程的分析中要考虑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与效率损失之间的替代关系非常类似。近年来，关于社会保障的经验研究表明，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储蓄水平，并导致人们提前退休。

对支出项目的研究，既有行为效应分析，也有一般均衡分析。例如，对社

会保障支出的研究，既有对社会保障项目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效应分析，也有关于社会保障及其改革措施的一般均衡效应的经验性研究（如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或部分积累制转变的效应分析），目的是设计出最优改革方案。对其他一些社会保险计划的研究，也类似地估计了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在提供这类社会保障时对激励和效率所造成的扭曲。例如，在美国，由于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不仅开支巨大，而且社会影响广，再加之有现成的关于医疗保险服务费用的大量基础数据，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分析因而成为公共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从儿童照料到司法审判的一系列政府支出计划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在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方面，公共经济学着重研究了各种地方税收和补助条例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和分配的影响；教育竞争对各种教育后果影响的研究；奖学金支出对大学入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家庭储蓄的影响。通过对项目的全部收益和为项目筹措资金的全部税收成本（包括税收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确定项目的经济社会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即未来改革提供依据。

宏观经济研究。宏观经济问题重新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曾经是财政学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部分内容大都转移到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中去了。因而，近年来，公共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的：（1）如何通过投资税收抵免和加速折旧等税收制度规定影响企业投资，进而达到反周期的效果；（2）主要社会保险项目的宏观经济影响。例如，失业保险提高了失业水平，并使失业周期加快。公共经济学家研究了失业保险对失业水平和失业特征的影响，研究并提出了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保险办法；（3）通货膨胀与税收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储蓄和投资间分配比例的影响等。

财政联邦制。各级政府如何选择各自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上级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下级政府的选择，各地区间的税收和支出差别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行为和政府项目的最终结果等，这些所谓的财政联邦制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公共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类研究目前主要针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但是，随着欧盟日益朝着财政联邦制结构的方向发展，对财政联邦制问题的研究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二

对于公共经济学科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大批突破性的研究

成果，国外学者进行了回顾性的总结和评述。1972年创刊的《公共经济学杂志》是发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权威刊物。近年来，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学术权威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献评述性的文章。在2002年第12期上，费尔德斯坦发表了“*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Economics: 1970 – 2000*”，总结了过去三十年公共经济学研究性质与内容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公共经济学更加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和经验实证分析，更加关注实际政策，更多地涉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经济效应问题；戴蒙德（Peter Diamond）发表了“*Public Finance Theory – Then and N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发表了“*New perspectives on public finance: recen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由于作者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评述自然是高屋建瓴，视角全面，分析深入，既对公共经济学近几十年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概述，也对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展望。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展开了公共经济学的多角度研究。一是跟踪国外公共经济学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多部经典公共经济学著作，如彼得·M·杰克逊主编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2000），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公共经济学》（蔡江南译，1994），加雷斯·迈尔斯（Gareth Myles）的《公共经济学》（匡小平译，2001），布朗和杰克逊（C. V. Brown, P. M. Jackson）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张馨译，2000）等，同时对西方的著名公共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也进行了重点推介，如对阿特金森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贡献的介绍（唐任伍等，2001），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克里（William S. Vickrey，又译为维克瑞）对公共经济学贡献的介绍（李会明等，2001）等。二是借鉴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成果，撰写中国版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如《公共经济学大辞典》（郭庆旺等，1999）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部内容较全面的工具书；《公共（部门）经济学》（郭庆旺等，2005；高培勇等，2001；樊丽明，2001）等著作在改革传统财政学、运用新的理论框架分析政府活动的经济效应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三是以公共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探讨中国的公共经济问题，如《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齐守印，2002）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公共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模式进行了探索。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公共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都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分析，我们认为：（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变化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公共部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公私两大部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整体。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公共物品消费在个人总消费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公民对公共部门